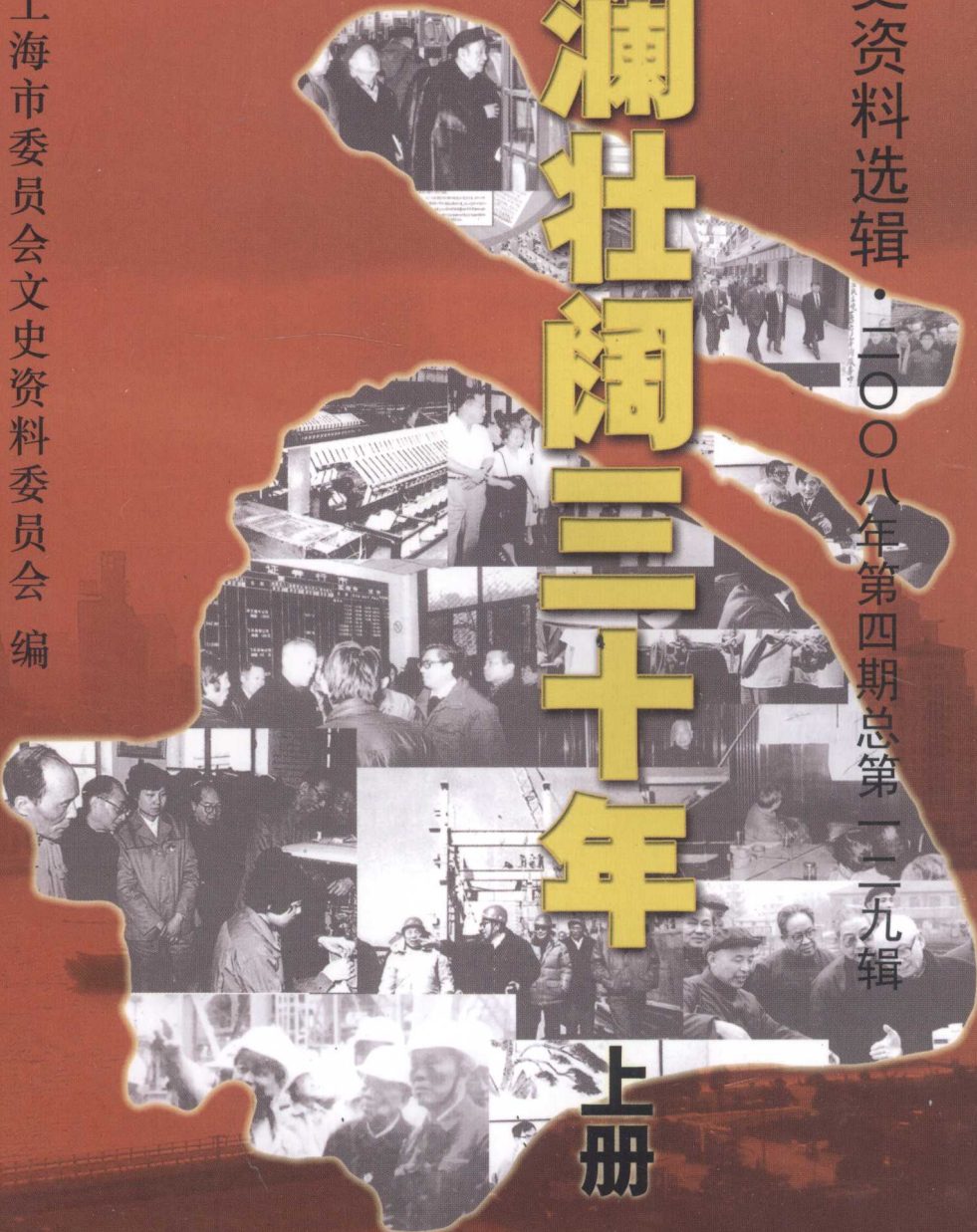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二〇〇八年第四期总第二一九辑

波澜壮阔三十年

上册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波澜壮阔三十年

上册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主 编 孙 颢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波澜壮阔三十年 (2008年第4期, 总第一二九辑)

出版: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北京西路860号)
(上海市殷高路23弄28号)
出版日期: 2008年12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0—6109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229/G2

定价: 76元

目录

同心同德 建言献策 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李国豪	1
在教训中不断完善	谢丽娟	4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由来	王荣华	6
宝山湖工程决策思考	凌逸飞	11
对宝钢建设视察并提出建议	唐 仁	25
政协委员视察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	唐 仁	27
中外合作的锦江花园饭店的建成	张乾源	30
上海联谊大厦	张乾源	34
改革开放中第一家同业公会	姜允熹	37
我与豫园商城的三次飞跃	程秉海	43
中国第一个自行车集团	章和轼	55
和镕基同志一起接待美国客人	胡嘉福	65
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上海贝岭公司记实	陆德纯	68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上海图书馆新馆的关爱	王鹤鸣	73
全国最早成立的编辑学会	雷群明	84
海滩成海景	苏新泉	92
从修桥、铺路、造房到办实事形成制度	李仁杰	94
改革开放满园春 十年大桥梦成真	杨新民	98
上海国际风筝会纪盛	杨新民	105
关注民情系民生 参政议政建和谐	顾国柱	108
我对届内十件提案的温习	张金泉	113
提案的魅力	万菊来	117

三中全会激励我更好地为侨服务	奕纪梁	120
感人故事	胡楚南	124
党的十四大以来上海理论武装工作的追述	朱敏彦	127
两岸亲情——“线”牵	秦 演	139
感恩改革开放，我的前后两个“30”年	马建军	142
我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	王彦聚	146
三十年前	徐建国	149
虹桥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傅海萍	151
机遇改变人生	陈玉屏	154
还是咱们的家乡好	袁雪尘	157
我的精神家园	杨黎明	163
艰苦创业 坚守信誉 服务社会	饶思炎	167
一个老年民革党员的心声	林云云	170
沐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之下	陈 涛	173
人生最有意义的黄金岁月	李启新	175
三十年，从奇迹回归平凡	缪新亚	178
算盘、计算器、电脑	吴鹏云	182
我与改革开放	王 蕴	184
一个财会眼中的变化	陈 琇	188
老有所乐在田林	徐福型	190
谈参政议政的体会	邹逸麟	192
共和国同龄人的祝福	马莉莉	195
我为中国加入WTO做了一点事	许心礼	200
忆中山学社成立前后的经过	翁曙冠	202

我的第一封汇报信	徐本力	204
我是怎样做特约审计员的	王定甫	206
尽职尽责当好特邀监督员	郑惠强	208
北京纪行	张淑平	211
坚定信念 矢志不渝	滕家骧	213
党的关怀暖我心	秦卫堂	216
为做好民盟的参政议政工作而尽自己的力量	徐方瞿	219
创办“建国信用社”的前前后后	朱鑑曾	222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	张挽澜	225
四平街道每天都有新变化	薛建新	227
没有1978，就不会有新生的我	冯 扬	230
从衣着变化看改革开放30年的变迁	刘丕莘	233
改革开放成就了伟大转型	丁 毅	238
乘车行路话交通	徐晋庆	241
“储粮存折”，你见过吗	沈志义	243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学教育	蔡达峰	245
改革开放是多党合作制度推进的不竭动力	陈强努	254
改革开放使民主党派获得新生	蒋家祥	259
永别了，粮票	沈嘉禄	262
从细微之处看三十年巨变	吴玉雷	265
改革开放给民主党派带来蓬勃生机	黄关桢	267
荣辱与共赞改革 肝胆相照话开放	周炳权	270
由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看改革开放三十年	张国勇	274
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焕发异彩	张振华	278

新起点 新征途	徐伟人 284
肩抗闸门 放青年奔向光明	程海麟 288
改革开放后的一次标志性盛会	苏怀一 292
往事历历在目	苏怀一 294
为可爱的祖国拼搏	步一军 298
改革开放鼓励我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	陆敬业 301
忆台胞工作三十年	梁素霞 305
改革开放的春风温暖了我的家	林 琳 311
台胞姐妹看“青年歌手大奖赛”	陈美真 313
春天里的故事	王谨敏 316
当政协委员，是我人生中精彩的一页	柯丽珠 319
选择上海，融入上海	柯丽珠 324
哥哥的激动	朱懿明 326

同心同德 建言献策

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李国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时，我虽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壮心未已”，决心以自己多年积累的学识和智慧，投身到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中去，为国家的重大工程建设，提供科技咨询；为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决策，建言献策；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微薄之力。

70年代末，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中央决定在上海宝山建设特大型钢铁基地。我当时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被选为上海市科协主席。为了确保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性，中央和市委邀请上海市科技界、工程界一批著名专家组成了“宝钢顾问委员会”，我被聘请为首席顾问。1980年初，宝钢工地出现了桩基水平位移的严重问题。一位中央领导接连下达指示：“千万不要出岔子”，“要慎重、慎重、再慎重”。日本专家提出了防止桩基位移加固的方法，但在计算方法上存在问题，而且工程量大，造价昂贵。情况发生后，应宝钢总指挥的邀请，我和顾问委员会专家们很快赶到宝钢，深入现场，实地勘察。我们经过暑期一个多月的分析计算，向工程指挥部提供了《关于桩基的水平位移、内力和荷载力的分析》的研究报告，对位移桩的承载力、需要加固的范围和合理加固措施，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指挥部根据这个方案，采取积极措施，解决了桩基位移问题，不仅节约了大量投资，而且缩短了工期。

1981年，国家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宝钢下马的论调。当时，有关部门领导对宝钢工程作出这样的批示：“二期工程取

消，一期工程下马，论证善后方案”。宝钢一时面临着上还是下的重大抉择。在宝钢工程调整论证会上，面对当时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基调，我和顾问委员会专家们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三个论点，坚决反对宝钢下马。（一）宝钢不是从零开始，已花费了80多亿，再投资20来个亿，就能建成一期。（二）宝钢下马，将会带来本厂和国内协作厂的大量职工失业，影响很大。（三）一期工程不能下，二期工程也不能下，这是宝钢的两条腿。论证会最后得出了宝钢不能下马的结论，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采纳。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宝钢已建成中国和世界著名的钢铁工业基地。宝钢的领导和广大职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说“以李国豪为首的顾问委员会，是我们风雨同舟的朋友”。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1982年，中央和市委领导决定在黄浦江上建造大桥。这对于我，一个从事了一辈子桥梁学科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老科技工作者来讲，是一件莫大的喜事。当时我担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同济大学名誉校长。受上海市科委的重托，我带领同济大学桥梁系的教师 and 科技人员，进行南浦大桥的可行性研究。经过反复调查、论证和思考，1983年9月，我们向上海市科委提交了“叠合梁斜拉桥”的建桥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这种跨江大桥，在国内没有先例，在国际上也属罕见。谁来设计大桥，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决策者面前。当时，日本提出免费设计南浦大桥，并提供贷款，条件是工程必须由他们承担。我想，中国桥梁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黄浦江上架桥。我向市领导反映了这个想法，并由我的助手项海帆院士代表同济大学桥梁系的教师向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力陈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南浦大桥的理由。1987年9月，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信上批示：“我看主意应该定了，就以中国人为主设计，集思广益”。这个果断决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工程专家的无比信赖，给了专家们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南浦大桥设计、建造中，我担任了专家组组长，积极参与解决工程中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尽心尽力为大桥建设作贡献。后来，广东准备在珠江三角洲虎门建造跨珠江大桥时，我了解到，业主有意请英国人设计建造就立即写信给当时的

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同志，认为虎门是当年林则徐销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场。建造虎门大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叶选平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大桥建设时，我担任了专家组组长，在中国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桥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跨度悬索桥，终于在虎门建成了。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上海要建设成为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国际航运中心。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一个优质的深水港是不行的。对此，上海市领导和有关部门根据多年考虑、研究，确定大、小洋山为对象，组成专家组，并请我担任组长，负责深水港的选址和论证工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的专家论证，圆满完成了可行性研究。但由于各种原因，上海建造国际深水港的计划被搁浅了。去年9月和10月，我先后两次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在信中充分表达了必须尽快在上海建造深水港的意见。10月20日，在镇江长江大桥开工典礼上，我见到了江泽民主席，又向他进一步说明了建设上海国际深水港的可行性和紧迫性。江主席回京后很快召见国家计委领导了解情况，并在我的信上作了四点批示，特别强调建设上海国际深水港“意义非常重大”，要求“全国有关各方顾全大局，通力合作建设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下，大、小洋山深水港工程已正式列入国家项目，今年夏天将完成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明年正式开工。不久的将来，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深水港湾将屹立在东海上。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大量事实证明，党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走上强国富民之路。我虽然已是88岁的老人，但仍要认真学习和积极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充分发挥一名老盟员、老党员、老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尽心尽力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献计献策，努力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

在教训中不断完善

谢丽娟

1988年春天暴发的食源型甲肝流行，在肆虐了两个多月后很快被平息，但对于上海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的暴发流行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同时在防治甲肝的过程中我们也获得很多宝贵的启示和经验。对于上海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立流行病预警机制、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例如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甲肝暴发后建立起来的。会议由分管卫生和财贸的两名副市长主持，有关部委办负责人参加，研究、决定重大的食品卫生问题。区县政府也建立相应的联系会议制度。又如市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区县卫生防疫站先后建立食品卫生监督员巡回执法队，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及重点品种进行监督执法，此外还修订多个食品卫生管理规定，使食品卫生工作得到了有力加强。经过这次疫情，上海市民的卫生习惯有了很大改善。很多市民洗手非常勤快，养成了“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饭店里面使用公筷的做法也在那时得到推广。

从整体而言，“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可以说，全体上海人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在2002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袭来时，医护人员重视消毒隔离，上海人民重视预防，使“非典”的传播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非典”之后的禽流感疫情也是这样，大家都能应付裕如。因此，在经受了一次大的锻炼、考验之后，认真地建立并完善了一些制度，是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年上海防治甲肝疫情的工作并非没有遗憾。比如，当时的公共卫生信息发布机制很不健全（封闭的结果是得不到卫生部的指导、得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和理解）。我国对传染病的发病数是严格保密的，卫生部门统计的发病人数，只能是内部小范围

传达，从来不在报纸上公布。当时，上海的“甲肝”暴发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注意，世界卫生组织就向我国卫生部了解疫情，卫生部来问上海，但上海对这方面的情况是封锁的。时任卫生部长的陈敏章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催促几次了，你们一定要报告疫情。我很为难，不上报是不尊重卫生部长，而市府按早先的规定不能公开疫情。直到几年后甲肝流行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做法与后来“非典”、禽流感疫情传播时“一日一公布”的做法大相径庭。这是社会开放进步的体现，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但是我们还是要思考，为什么“非典”会来？为什么禽流感会来？原因还在于平时的卫生防疫工作没有到位。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进步，但是无论是食品卫生、还是环境卫生仍有不少薄弱之处。“以人为本”还是“以利为本”尚缺少有力的法制管理，“预防为主”的理念尚未扎根于实践。如果我们回顾受挫的史实，能够推进今天预防措施的完善，并能触类旁通，那么这受挫的史实便可成为巨大的财富。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由来

王荣华

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起源于上世纪末，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全国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逐步明确，各项改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教育领域的改革发展不断深化，素质教育开始全面实施，高等教育领域的三大改革即管理体制、收费制度和后勤社会化等纷至沓来。从上海看，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浦东开放开发以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项社会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委、市政府根据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精神确立了上海的城市发展战略，即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总体目标。一流城市需要一流教育。上海的教育事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教育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教育质量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然而，无论在结构、质量、规模和效益等方面，上海的教育还不能适应城市发展战略的新要求。我们认为，单项改革已不能解决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上海教育需要综合配套的改革。上海教育要更好地为上海和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上海有责任为全国其他省市的教育改革发展提供经验。

1998年9月，李岚清同志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要进一步进行教育整体改革试点、大胆探索，取得新的突破。根据李岚清同志的指示，上海市委市政府迅速作出了相应的部署。1999年6月，市政府致函教育部（沪府函[1999]68号），希望教育部授权上海市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需的配套政策，初步明确了上海有意进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的意向。5个月后，教育部复函市政府（教发函[1999]148号），表示“我部赞成和支持上海市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支持上海市在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范围内进行省级政府统筹教育的大胆探索”。教育部的复函标志着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正式开始。

教育综合改革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在全国也是首例，改什么，怎么改等问题，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为慎重起见，我们对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方案进行了充分的酝酿，从教育部复函一直到市政府向国务院正式递交请示报告，其中经过了数年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立即着手进行了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研究制订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方案；二是着手起草请示报告。

在准备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方案时，为稳妥起见（主要是避免地方向教育部争权的质疑），我们提出必须要正确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以及依法行政和开拓创新的关系。所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必须以此为前提。

此后，我们开展了全方位的咨询、研讨和论证工作。先是召开了高校书记、校长专题研讨会，后又听取了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专家的意见。其间，我们还多次专程赴北京，向教育部领导和相关司局进行了汇报和沟通。最后，我们选取了当时上海教育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作为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的内容，并力求有实质性的突破。

当时的试验方案共有四部分内容：一是关于学校和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的审批；二是关于高校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关于课程教材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四是关于教育经费筹措与收费的改革。其中心内容是在本专科学校的设置和高校学科专业的设置上进行改革试验，如进行招生计划和高考改革的试点、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等，特别是第四部分的内容改革力度较大，涉及教育经济政策方面，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同意上海采取特殊的政策。

在研制试验方案的同时，我们起草了请示报告，在多次调研、讨论的基础上，对请示报告的内容先后进行了24次修改。2002年10月14日，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签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正式递交了《关于我市实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的请示》，最终的请示报告虽然只有短短的1400多字，但几乎每句话都进行了反复的斟酌，都有很高的含金量。

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历程。为了使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尽量完善，我们广大参与同志付出了许多心血，也倾注了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期望。

2001年6月，李岚清同志在上海视察时又一次强调：我支持上海教育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只要有利于素质教育，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办好了是你们的贡献。他还表示，上海有能力搞好这方面的工作，能够为全国提供这方面的经验。随后，上海进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被列入了国务院督办项目，并两次督办教育部，加紧落实。

市委市政府对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视，黄菊同志专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重要指示。其他市委市政府领导如龚学平同志、殷一璀同志和周慕尧同志对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工作也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陈至立同志一直对上海进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高度关注。她指出：教育部一直将上海作为实验区。有些工作别的地方不能做，上海可以先试，让上海有自主权，上海要给全国提供经验。在请示报告的起草过程中，她不仅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给予了具体的指导，还召开了教育部党组会议专门讨论，此外，她还派有关同志多次来上海进行商讨和指导。同时，教育部也就我们的代拟稿内容征求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等中央有关部委的意见。

在请示报告递交国务院不久，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六大。江泽民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分组讨论时，对上海提出了“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在代表发言时，我联系上海的教育工作，对上海进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进行了汇报。

2003年2月11日，在请示报告递交四个月后，教育部受国务院委托，正式致函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实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并表示“我部赞成和支持你市进一步加大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除个别条款须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外，我部原则上同意你市提出的关于实施教育

综合改革的意见”。同时，教育部还转告了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发行教育彩票”以及“个人和企业的捐赠按一定比例抵充当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调节税”等问题的意见。财政部指出，“为确保国家有关教育收费政策的统一性，非义务教育收费就在三部委（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规定的最高标准内，实行差别收费”，国家计委指出：“对社会力量举办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坚持以不营利为目的的原则，按成本收费。对研究生收费，在积极探索多渠道筹措经费的基础上，逐步研究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但博士生除外”。

根据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说明，李岚清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对上海的申请报告作了批示，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批复教育部，授权教育部为主要协调部门，并代表国务院回复上海。因此，教育部给上海市政府的复函是正式答复，上海可以照此函实施。至此，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从方案阶段正式步入操作阶段。

2003年以后，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调到上海市政协任职，但依然关注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工作，此项工作也在按原计划有条不紊的展开。虽然教育部以及相关部门领导也发生了变更，但教育部的支持态度一如既往。2003年6月，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同志在上海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央授权上海进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心，体现了中央政府对上海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作出更大贡献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她还认为，上海是有条件有基础进行教育综合改革的。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2004年，上海市政协将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列为当年政协常委重点调研课题。在2004年7月12日召开的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上，市委市政府强调要“全面实施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在若干领域取得新突破。此次会议起到一个全民动员的作用，将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推向了一个高潮。经过五年左右的改革试验后，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下一轮改革又被提上日程。

2007年5月，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九次党代会上，市委在新形势下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要求，使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海市教委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正在抓紧研制《关于上海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去北京与教育部负责人进行沟通，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

目前，此项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我相信，新一轮上海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